海外华人经济发展与儒家文化

宫达非

The succes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economy has signified the positive factors in Confucian culture. The harmony and mutual benefit proposed by Confucian philosophers have always been stimulators for social stability and wealth accumulation.

一

在今天，我们研究和探寻全球经济问题时，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这就是海外华人事业的迅速发展。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世界上许多学者的重视。我们一般所说的海外华人，是指祖籍中国、定居海外已经加入所在国国籍、成为所在国公民的所谓华人少数民族（新加坡除外），也称华裔。如今，华人遍布世界各地，其人数已经发展到 3500 多万了（不含台湾、香港、澳门）。外国学者一般说法为：海外华人共有 5700 万，遍布于世界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与祖籍国人民具有共同的血缘、共同的文化和历史渊源。

中国人移居海外已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大量移民主要是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鸦片战争之后。当时海外华人的构成基本上是一些华工以及下层劳动群众，总体上没有什么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外华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发生明显变化。这些华夏子孙在祖辈创业的基础上（有的是自己创业），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适应所在国及地区政策的变化，顽强经营，不断进取，经济实力逐步增长起来，并开始形成许多华人财团，其流动资产（不含证券）总额据 1992 年 7 月美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估，已高达 2 万亿美元（包括台湾、香港、澳门，有的外国专家估计超过 3 万亿美元），从而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外国学者甚至评称为“大中华经济圈”、“世界第三经济势力”，称海外华人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企业家群体”“把亚洲经济推向顶峰”。外国舆论这样评论，可能有些过高，但是随着华人的文化水平、自身素质以及在居住国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特别是参与居住国的经济建设，从而受到所在国朝野人士的普遍理解与尊重，这也是事实。

从文化角度来看，海外华人在谋求运作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基本上仍是以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为主导。近一个世纪以来，华人经济与文化的良性互动，使得华人成为世界上一种独特而不容忽视的特有的民族群体。随着华人经济的发展，华人文化也日益受到关注。华人文化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又积极吸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优秀文化，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但是在多元的世界文化体系中，始终保持着自己民族的文化与思想，维持着中华民族的风格和形象，使他们在异国他乡得到充分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引起世界的重视。海外华人这一独特群体的主要文化标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儒学则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几千年历史的长河中汇集诸子百家，包

括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铸造而成的，而儒学则占了骨干的地位。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在 19世纪中叶以前，一直是一个经济与文化都很发达的国家，在海外谋生的华人，承袭传统，很自然地把儒学作为自身的文化主体（这里不需要分析说明在他们的生活实践中，很自然地吸取其精华而剔除其糟粕），不仅用以支撑他们的精神生活，为家庭伦理建设提供道德依据，而特别重要的是为海外华人企业的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具体运作提供了各层面的导向思想。同时还应该看到，海外华人身处现代资本主义多元文化氛围中，他们是在碰撞、吸收西方文明的条件下，身体力行，又为在世界各地传播儒学思想，为儒学在现代社会的重新发展，作出了贡献。在我一生的外交生涯中，从欧洲到美洲，从东南亚到非洲，结识不少海外华人朋友。当谈及他们自身或他们父辈艰辛创业时，差不多都会很自然地谈及传统儒学思想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在平常生活中，对内对外的一切行为，都是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指导的。他们谈到热爱祖国问题时说，今天祖国强大了，腰直起来了，当然更加热爱祖国。这就是传统文化陶冶和无形教育的结果（有的学者称此为“无文字的传统文化”）。他们说，他们不懂政治，但是儒家伦理道德世代相传，并且身体力行，成为做人敬业的准则，从而也受到居住国的尊重。

以往许多人都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儒学不利于经济发展，儒学不能导致现代经济体制的建立。但从海外华人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看，却不是这样。“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儒学原本具有使天下“大而富”、“与民同富”、“与民共利”、“与民同乐”的丰富内涵。海外华人在海外发展经济的长期实践中，证明“人能弘道”，这只是一个如何去实践的问题。

在华人最为集中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儒学是华人社区特

别是华人上层的基本信仰，许多华人还把儒学奉为儒教，是一种无神论的思想信仰。例如在香港，儒教就是与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并列的六大宗教之一。香港孔教学院创立于 1930 年，它致力于教育事业，培养后代。现任院长汤恩佳先生就是一位知名企业家。在印度尼西亚，华人早在 1923 年就创立了孔教总会（1963 年改为孔教联合会),出版书刊,教育后代。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是世界著名的东方伦理道德倡导者与实践者，被称为当代“最大儒者”。他把儒家理念应用到国家管理当中，阐扬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认为儒家伦理可以使年轻一代具有文化的稳定力量。他特别强调五伦和群体关系，使儒家思想渗透到新加坡这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的政治生活、企业经营管理、人们道德行为等各个方面，使新加坡成为全球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在 1982 年，他提出以儒家思想建立东方道德价值观，以抵制西方个人至上主义的生活方式。李光耀还出任会址永久设在北京的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理事长。在马来西亚、韩国、日本等国家，儒学不仅受到华人的普遍信仰，而且也受到当地部分人民及有识人士的欢迎和重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被西方学者称为是儒家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种东方经济发展模式。

美国华人建有许多儒学组织，定期举行活动，其中组织者都是有成就有社会地位的工商界人士。美国的华文学校还联合起来，制定长远计划，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宣传与教育工作。在欧洲联盟、北美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所谓“唐人街”，儒学的存在更是随处可见。据悉，世界华人以血缘、地缘、业缘等形式组织起来的社团已有六七千个之多，全球性的华人社团也有 70 个以上，而儒学则是世界华人团结和各种社团组织的基本价值坐标，是促进海外华人国际化、一体化、

大团结的思想凝聚力。

二

从海外华人经济的整体发展来看，儒学的影响与运用是多方面的，我这里不可能作全面讨论与分析，只根据海外华人朋友所谈，综合几个问题，略述于下：

儒学对华人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表现在道德建设方面。道德哲学是儒学中最重要的理论构成，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周密的体系。从先秦儒学一直到现代儒学，道德育人学说一以贯之，对社会的影响可谓无所不在。儒家道德学说以“仁义”为核心，强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人自身以及人与人，首先是人与家庭、人与集体、人与社会等各个方面形成一系列道德规范，这正是西方文化中所缺少的。海外华人将这种理念创造性地运用于经济运作当中，从而为处理家庭内部关系、企业内部劳资关系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居住国的关系，提供了适应的准则。华人家庭都具有中国传统的特质和儒家的伦理，华人企业家都非常重视家庭成员的教育培养，并把“齐家”看作是搞好企业（“平天下”）的基础。有了这一牢固稳定的基础，华人企业能够以家族经营为核心，从而在企业集团的经营管理和组织结构上，都染上一层亲缘和家族经营色彩。各个企业集团的核心领导层，都由对家族忠诚和具有责任感的财团家族成员或家族姻亲组成和控制，从而为资本初期积累奠定了基础，也为其进一步向世界市场拓展与竞争创造了条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切是在西方文化氛围下操作的，显然已经不是中国封建礼教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新的创造。这其中很有学问，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的。华人企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家都具有擅长理财、遵守信用、适应力强、洞察力敏锐，特别是毅力坚强、勤奋节俭的特点，这些因素对其企业的发展往往产生巨大效果，都与他们从青少年时代所受的家庭伦理教育和熏陶分不开。马来西亚的“糖业大王”郭鹤年（净资产达 21 亿美元）曾经说：“从小我们就被灌输儒家的道德价值观。老人们经常教育我们要讲商业道德，重视信誉，言而有信。这一切都深深印在我心里。母亲还告诉我要注重口德，不要诋毁别人。”郭鹤年先生平生一直遵守这些教诲，为人行事，立家兴业，成为楷模。

在企业内部关系的处理方面，也像处理家庭关系一样，“有亲”、“有义”、“有序”、“有信”、“有别”，明确上下级的关系、职责、责任。在处理与其他企业的关系时，则特别强调‘有信’，将信用、信誉看作企业的生命，重和睦、讲情谊、诚实不欺，在竞争中不失“仁义”，不破坏规则。在企业经营之中也有竞争，但在困难时，又会发扬‘守望相助、相互扶持’的美德。在商店日常营业中，贯彻童叟无欺、货真价实、广招往来、讲信义、和气生财、“买卖不成仁义在”等等。总之，儒家道德哲学贯穿在华人企业的各个方面，其特征就在于把家庭伦理扩大、应用到企业管理与经营当中。儒家哲理最大特点就是由近及远，由简至繁，由浅入深，把‘亲亲’的道德理念宏展于社会事业。

其次，儒学对理想人格的注重，影响海外华人企业家将自己的理想人格追求定位为“儒商”（儒企）。“儒”本来是“学者”的意思，我国古代有“儒将”的讲法，是指有学者风度和涵养的将帅。“儒商”就是有学问的商人，他们不仅善于经营，还非常注重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待人接物，出入“儒门”，为人“儒雅”，行为具有‘儒风’，与他人交接要讲‘礼仪’。当然，更重要的内涵是在其商业经济生活中，要具有儒家道德规范。许

多海外华人企业家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具有一定修养。他们有理想，有追求，在重视经营利润的同时，还秉承传统伦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一类遗训，反对“不义而富”，反对不顾一切地追求利润，把天人、理欲、义利联系起来，注重取之有道等等。总之，“儒商”（儒企）在世界上树立了东方企业家的形象，突出了德才兼备思想，这与现代经济模式要求企业家有高层次的文化素质是一致的。

其三，儒家的包融精神影响海外华人企业家积极吸收一切对他们有益的东西，将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起来。华人企业吸收了儒家的‘诚’‘信’‘义’等许多理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在经营管理中很自然采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特别是在工业化、信息化与产业化的现代化过程中，吸收并运用西方各种先进的科技文化，顺应世情，开拓发展，这都与儒学的包融性、对外部世界的兼容并蓄性以及适应外部世界并广泛吸纳不同文化的可塑性是分不开的。儒家“五行”即仁、义、礼、智、信，其中“智”既含有智慧的意思，也含有学习、思考的意思。人要取得智慧，就需要学习、思考，就必须尊重知识，懂得不耻下问的道理。儒家经典中有“学以聚之。问以辨之”的讲法，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讲法。就是说，只要是“善”的，都应该去“学”，都应该去“聚”，并运用到实际行动当中。不这样做，就是‘不智’。海外华人能够把现代经济运作方式适时运用起来，不固步自封，这是很了不起的造就和建树。

其四，儒学的宗族群体观念直接为海外华人经济提供了发展动力。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家族群体主义上面。曾有学者指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主要依赖于“家族集体主义”的社会秩序文化。这种企业文化，在日本和韩国为企业的

经营管理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欧美的自由企业制度，提供了一个包括每个成员及其家属生活方式的组织系统模式，使企业具有活力。儒家的“家族集体主义”思想，使得华人能够通过同乡、同族、亲友等血缘纽带形成互助网络，建立横向结构，团结互助，共同生存发展。海外华人具有的这一特点，正是在经济上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还应看到，这种“家族集体主义”思想加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实际上壮大了企业的整体实力。

西方学者评称，当前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概括有四种形式：第一种是英美市场机制式；第二种是欧洲德法国家介入式；第三种是由社会民主党思想指导的斯堪的那维亚式；第四种是亚洲式（日本及“四小龙”），主要是由东方儒家文化为指导的资本主义，人的生存以企业为中心，劳资双方合作良好，把工厂变成一个大家庭，共成败，共兴衰，讲求集体利害。这种有儒家风范的资本主义的迅速崛起，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西方学者称之为具有“东方意识”的“亚洲模式”。这种模式和海外华人的经济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最后，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海外华人以儒家“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使自己能远处异国，安身立命，开创事业，应世前进，这是最值得称赞、最值得钦佩的。在初期，有些人是孑然一身，漂洋过海谋求生存，其艰辛之情，可谓血泪倾注。我在美国参观一些当年华人劳工营地，与“非洲黑奴贩卖营”完全一样。如果没有“坚韧不拔之志”、“忍常人所不能忍”者，是很难活下去的。及至事业有所发展，则又会与居住国产生新的矛盾。在诸多复杂情况下，不管遇到什么性质的问题，都能很好地处理，更能够在居住国内广交朋友，以至政界朋友。他们既热爱其祖籍国，又爱其居住国（在二战中，许多华人与居住国人民同仇敌忾，甚至毁家纾难者，比比皆有），并

且能够成为居住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这在东南亚国家中，表现得尤为充分。

目前，儒学的研究在中国大陆也正受到重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儒商”、“儒企”文明伦理道德的建设，也都试图在传统文化研究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我觉得，海外华人企业家经济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关系，给予我们丰富的启发。对此，我们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希望今后能够得到专家的重视。我们正处于“地球村”信息时代，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生活习尚，都在日新月异地变化发展。东西方经济、文化的碰撞已处于关键的时刻，海外华人经济、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已引起世界学者的重视。今后的年代不管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经历什么样的曲折，我想和平、友爱、自由、民主、文明、进步、公平、共同富裕，仍是全人类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在这时代的大潮中，海外华人自会有他们自己新的杰出的应时而进的创造。

选自《华人经济年鉴》 1996年

作者简介

宫达非，山东莱阳人。生于 1917 年。早年投身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外交部副司长、部长助理、办公厅主任等。自 80 年代起，出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顾问等。现任中国非洲友好协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苏联剧变新探》等。

中国因素与东亚增长

李光耀

In her 14 years of open-door policy, China has achieved the 8.6% GNP development. In the next 14 years China can be expected to gain faster development. In all the successes China has made, the Chinese culture has been proven the active incentiv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er economy.

世界重新组合

当今世界处在一个转折点。在苏联解体之后，地缘政治平衡处于动荡不安和变化的过程中，大概还需 20～30 年，俄罗斯才能再次扮演一个主要大国的角色。

欧洲正在不定形地演变。一方面它对俄罗斯共和国和独联体国家中发生的严重动乱感到忧虑；另一方面，以法国率先，德国紧跟，欧洲可能变得足够强大而成为全球一支独立力量。目前，美国仍然是西方无可争议的领袖。

同时，东亚处于一个剧烈变化的开放阶段中。在 50 年内，从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延伸到亚细亚各国，将可能出现一

条具有高生活水平和现代化工业国家的地带。这一地区将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最大的市场。

日本从 1868 年起花了 100 多年时间实现了工业化，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则正用约 50 年时间完成这一步。亚细亚其他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也不会比新兴工业国家落后很远。

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引用日本财政金融研究所的预报说，到 2010～2015 年，仅仅日本、新兴工业国家和亚细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将大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大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而几乎与欧共体 12 国相等。

亚洲开发银行 1990 年的预测是，日本将以 4％的速度增长，新兴工业国家和亚细亚国家为 6％～8％，中国则为 7％。

有关东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文章和发言在其他会议上屡见不鲜。在北京中国国际信托公司举行的这次会议上请允许我集中谈谈中国，看看中国因素怎样能增强这一东亚增长模式。

单就中国来说，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①而不发生逆转，到 2040 年时，她的人口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与台湾持平。那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 13 兆美元而大于美国和欧共体 1990 年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如果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购买能力平价为基础计算，则将在 2015 年达到这一水平。

中国的进步

首先，让我列举中国业已取得的成就。

一、她已开放了一些沿海地区；

二、她已将权力和责任下放到各省和地方政府；

三、她的财政和贸易政策引来了外来投资，改善了偿付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力，增加了外汇储备；

四、在许多领域已解除价格管制，减少了补贴。然而，对工业基本原材料、能源和交通仍然给予大量补贴，使经济发生扭曲；

五、有意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

六、有些城市，例如上海已开始建立类似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的社会保险体系。她现在业已意识到，将社会需求的负担如住房、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支持，加在投资者身上，把投资者当成工作单位，不利于吸引投资。在市场经济国家，这些社会负担均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负担。工人们将更加灵活机动并对经济作出更好的贡献。

在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是来自海外华人投资者创造的。他们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和亚细亚国家。因为他们与中国同文同种，说普通话或地方方言，他们能够克服现存的困难，例如缺乏各项法律的透明度和缺少一个开放和有效的，能公正处理相互竞争的企业间问题的管理系统。

虽然一些跨国公司，例如惠普和菲力士在中国干得不错，但从美国、欧共体甚至日本来的跨国公司通常都发现要通过错综复杂的官僚机构找到解决办法是很可怕的。

然而，中国也需要一个稳定而不是必须依靠“关系”的外资投入。明确的商业法规和廉洁的行政管理机构，将使得工业化国家的非华裔的投资者可以来投资而和华裔投资者相比不会太吃亏。

他们将带来更广泛的技术。过分地依靠华裔投资者将使中国的技术和管理技能局限于仅在台湾、香港和亚细亚国家的范围内的技能。虽然这些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水平提高得很快，但从技术的广度和深度来看，他们现在还没赶上先进国家。

对中国经济最能补充的伙伴是日本。日本是从地理上、历史上和文化上都与中国最相近的先进国家。如果中国同日本能确保基于经济合作而不是基于军事力量的和平和长期稳定关系，中国和日本都将从中获得巨大效益。

仅次于日本，美国对中国经济也是最重要的国家。美国是吸收中国工业品出口最多的国家。当然也不能遗忘欧洲。目前它们的精力全部集中在统一的欧洲市场、东欧、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独联体国家。但是，到本世纪末，它们将有资源再次到中国投资。日本、美国和欧共体在中国的投资将使这些国家的市场向中国出口商品更加开放，特别是对来自他们所投资企业的产品。

我曾问过新加坡负责贸易和投资的官员，如何能将外国投资者与华裔投资者置于平等的基础上，而不使他们感到吃亏。我将他们的答复综述如下：

一、建立一个官员们遵守、得到法院实施的明确的商业和经济法规的合适的法律框架。中国国际经济和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已成为世界上最忙的仲裁中心，但是，能够赢得仲裁裁定的外国人却还不能落实仲裁裁决。确实，北京的中央政府法院还不能使省级法院实施它的命令，使中国的官方部门按裁定偿清。

据报道，宁夏的中级法院甚至拒不执行北京法院对外国投资者有利而不利于地方经济的裁决。实施促裁的裁决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将使投资者觉得中国有法可依。法律一旦公布，政府就应付诸实施，而且必须对中国人和外国商人是一律平等的。更进一步说，法官必须对双方一视同仁实施裁决，在诉讼方面不能只对国营企业有利，或者对政府有利。

二、向各机构和政府部门申请办事的程序都要有透明度和

清晰性。

三、中央、省、市各级行政当局的行政管理权限要十分清楚，界线要分明。

他们举出一些例子，说明缺乏透明度如何给新加坡那些没有特别关系的投资造成了意想不到的麻烦。新加坡投资者和（中国）地方市政当局合资经营的一个旅馆在 1989 年 1 月被市电局停止电力供应。由于严重的缺电，每周轮流供电四天，停电三天。但是其他的合资旅馆却正常供电，因为他们同市供电局有一个特别协议，保证为他们不间断地供电。

新加坡华人的投资者同当地的联系不如香港华人投资者，他不知道这种要求，中方合作伙伴也忽视了这一点。这个旅馆的总经理虽然提出了愿付高价电费，但还是不能恢复电力供应。

另一个例子是，对当地的了解使新加坡航空公司避免了由于缺乏透明度所造成的麻烦。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子公司新加坡机场终站服务有限公司想要在北京建立一个航空食品厂为从北京起飞的航班提供食品。

我们的商务和投资官员劝告他们，首先要得到供应水的保证，因为这在北京不是想当然的事情。其次，要订一个协议，让海关批准所有的水果、蔬菜、肉类从国外进口，因为通常这些食物是禁止进口的。如果新加坡机场终站服务有限公司没有得到这些劝告，他们可能碰到在广州的合资旅馆一样的麻烦。所以，为了吸引不讲汉语的外国投资者，明确对所有的人都清楚和公正的规定是非常重要的。

让我补充一句，我提供这些例子是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事实，不是因为我需要推进新加坡投资者的利益。

另外一点，在任何一个城市建立一个合资企业都要十多个政府部门盖上 100 多个印。对一个投资者来说，需要花很长的

时间去了解各种规章和谈判条款。政府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又没有关于便利商业运行程序的明确的信息。投资者必须通过每一道程序，而每一道程序又产生众多的个人的相互干扰，即使对那些讲汉语的华裔来说，这也消耗他们许多时间和精力，对外国投资者来说，已成为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

经 济 管 理

在中国实施开放政策的 14 年间，中国达到了每年 8.6% 的平均增长率。在今后的 14 年中，中国将会比以前做得更出色。她已不再是对世界一无所知的初学者，在过去的 14 年中，为一些错误和教训付出了代价，应从中充分吸取经验。

所有计划经济和管理经济的官员们都必须了解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和经济管理中的标准作法。摆脱过去 40 多年中央计划经济管理的习惯方式是不容易的。他们必须了解市场经济规律是根本不同的，并且要转变思维和工作方式。例如：

一、搞计划经济的人一直喜欢在报告中制定一个能产生巨大影响的宏伟目标。所以他们追求投资规模。省一级的官员和地方城市一级的官员竞相吸引高额美元的外国投资，而不顾其他是否适应中国需求的因素，例如创造就业的能力或技术的适宜性。

同样，由于领导赞成高目标，国营企业就追求高产额，而不管产品的质量和是否需求。由此产生由国家承受的库存积压和损失。

二、有一个城市计划用 10 亿人民币建造两个 40 万吨的干船坞。新加坡的胜宝旺船厂告诉他们，由于今后国际船舶发展趋向使用小于 40 万吨的船，建议他们建造两个 25 万吨的浮坞，

可以节省 40%的费用。但是，该市的权力机构却得到指示要实行“影响更大的”10 亿元人民币的投资。

衡量成功的标准不能是其规模或影响的大小，这种衡量标准是错误的。在市场经济中效果好坏的正确衡量尺度是效益。

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外国公司集团提议建造一个耗资 25 亿美元的大型乙烯化工厂，产品将大量出口。这一建议遇到了困难，因为在现行的五年计划者已经设计建几个只供国内需求的小型乙烯厂。这些小厂由于没有大规模生产的节约能力，以致生产成本高。搞计划经济的官员们应该学习市场经济并抛弃旧的思想模式。在市场机制下，五年计划只能是指导性的，应根据市场条件及新的私有投资发生的变化定期审议更新。

进一步发展的方面

中国现在应该是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了。当主管经济的官员掌握了市场原则，他们将希望纠正以下一些弊端。

一、阻止商品流出和进入一个省的地区保护主义，这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利，必须停止。高效率的行业无论设在什么地方，都应允许其繁荣和发展。

二、目前，中国的土地租赁尚无统一规定，各省、市的做法不同，最长的租赁期为 50 年。不管租赁期长短，土地只有使用权而不能抵押和出售。结果是投资者不愿盖高级楼宇和工厂使土地增值，因为他们新增投资无利可图。如果中国允许外国人和本国公民转让他们长期租赁的土地，中国将会从中受益。转让租赁使租地内的物业在租赁内可以出售或抵押。中国并不会丧失主权，因为当租赁期满，土地及土地上所有建筑物将又回到政府名下。

三、在中国任何地方，而不仅仅是经济特区，外国投资者都应有权雇佣和解雇工人，建立自己的公司工作文化。

四、经营权和所有权应实行彻底分离。不管是市里、省里或中央政府各部官员都不得干预企业管理。虽然从技术上讲他们是合资企业的共有业主，他们必须让他们在合资企业的董事会里的成员来行使适当的管理权限。

五、为了吸收数百万失业者，每年到达工作年龄的数百万青年和数百万人浮于事的国营企业需要精简的人员，创造就业机会必须是中国首要的目标之一。中国必须大力发展服务行业。私营的客货运输、包装、物资流通和零售、美发厅、理发店、咖啡店、餐馆、建筑承包、修理店铺都有助于吸收失业人员。上海的服务业占其生产总值的 30%，而香港则是 71%，新加坡 63%（1990 年亚洲发展展望——亚洲发展银行）。

在未来的 25年中，中国主要城市的基础设施无论是高速公路、机场、集装箱码头、电讯或文秘和商务服务的装备程度将接近香港，其管理效率也将如此。到时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所到之处，经济增长将会加速，并且遍及中国各地。

中国也将成为一条龙，一条巨龙。东亚将成为世界有史以来经济增长最大的地区。

这是中国人民能办得到的事。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结构有足够的力量承受这种迅速的变革压力。妨碍中国前进的因素主要是缺少有必要的专业知识的官员，执行政策和落实计划的官员和干部们，必须受全面的训练，达到发达工业国家的标准；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是专家，而不仅仅是对党忠诚的干部。

干部都应该像我在 1988～1990 年间几次访问中国时所遇到的那些省长和市长，他们四五十岁，年富力强，受过良好的教育，阅历广。有远见，有能力。他们使投资者对中国开放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